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的跨境传播 与本土化过程（1937-1969）¹ ——以武汉合唱团 访问马来亚为例

Cross-border Spread and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1937-1969):
A Case Study of Wuhan Chorus Visiting Malaya

钱杉杉 / 何启才
(QIAN Shanshan / HO Kee Chye)

摘要

“武汉合唱团”组建于武汉成为中国抗战中心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顶峰，于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时出访。1938年至1940年，“武汉合唱团”到访马来亚进行宣传筹赈活动，在对华抗战与国共联合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其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跨境传播亦具有明显成效。同时，团内矛盾、党际关系及不同的马来亚华人身份认同，对于该团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以此宣传活动为代表的中国南来艺术团体对马来亚华人的民族主义的生成与发展产生影

钱杉杉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E-mail: qianshanshan@u.nus.edu

何启才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

E-mail: hkeechye@um.edu.my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22

响，而后期历史演进又作用于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的民族主义本土化之上，在华人民族主义消解与本土民族主义生成的过程中，影响到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历史。

关键词：“武汉合唱团”、民族主义、跨境传播、马来亚华人、马来西亚

Abstract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Wuhan was a hub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leading to high nationalist sentiment in China. The Wuhan Chorus, formed there, later visited Malaya when Wuhan was abandon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38 to 1940, the chorus conducted propaganda and relief activities in Malaya, positively influencing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and Kuomintang-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operation and also having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opagation of nationalism among Malayan Chinese. However,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inter-party relationships, and different overseas Chinese identifications negatively impacted the chorus. The Wuhan Choru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Malayan Chinese nationalism's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later historical evolution led to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istic localization, which ultimately dissolved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established Malaysian nationalism, significantly impacting the history of Malaya/Malaysia.

Keywords: Wuhan Chorus, Nationalism, Cross-border transmission, Malayan Chinese, Malaysia

一、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中国与马来亚皆是世界局势中重要的一环。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成为亚洲战争主战场，深刻影响着二战走势与世界局势。就中国而言，马来亚远离中国本土，前期日军对其控制力度有限，且马来亚具有丰富的华人资本累积，因此，成为中国政府获取国际认同与财物援助的重要门户。就马来亚而言，中日战争是亚洲二战的前奏，中国的战局演变对于周边国家意义深远。而短时期内中国发生的数次革命，诸如维新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与共产党各自号召的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分裂、第二次国共合作

与分裂、国共内战等等，的确或隐或显的作用于马来亚华人之上。而作为具有一定人口基数的华人群体，其多元身份认同与华人社群式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原乡想象与中华文化的保留，使中日战争时期，华人群体给予中国较多的物质与精神支持。这一援华方式，除大部分由“外”向“内”输入的，即华人群体自发主动的物资援华外，也产生部分由“内”向“外”输出的，即中国团体主动争取的出访筹赈行为。目前学界对于前者的研究非常丰富，而关于后者的研究则较少。

就有关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筹赈活动与民族主义现有研究而言，首先，关于本土华人筹赈中国的研究上，目前学界对于战前华人筹赈活动研究较多，且以重要华人领袖的个案研究较为丰富，群体研究则相对较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群体研究包括《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5）》（杨建成1982）、《华侨与抗日战争》（曾瑞炎1988）、《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庄国土2001）、《华侨与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文化交流部2006）等。而有关本土华人的身份认同与民族主义的相关研究上，包括但不限于*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Akashi 1970)、*Malayan Chinese and China: Conversion in Identity Consciousness, 1945-1957* (Hara 2003)、《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12-1949）》（李盈慧1997）、*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1-1946* (Cheah 2012)、《战前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国性”与“华人性”问题——以印马越泰为例》（谢侃侃2019）等。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于马来亚华人对中国抗战的贡献，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等有全面系统分析，不足在于，就中日战争期间马来亚华人与旅马中国艺术筹赈团体间互动分析较少。

而有关武汉合唱团的现有研究方面，主要是资料集《赤子丹心——武汉合唱团南洋筹赈巡回演出纪实》（叶奇思2006），² 硕士论文《抗战时期的武汉合唱团研究》（刘恒秀2018）等。前者以新加坡、柔佛州、马六甲、森美兰州、雪兰莪州、彭亨州、霹雳州、槟城、吉打州分章，汇编成书，于本研究的研究资料部分，有极大助益。后者简述“武汉合唱团”的

历史、组织结构和社会活动，从音乐学角度分析《思乡曲》、《卖花词》、《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四首代表作，肯定了该团的历史贡献。该研究主要着眼于乐理层面，并补充了叶奇思所著资料集缺少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团员黄源尹（刘恒秀2018：28），但对于“武汉合唱团”的建立因素，马来亚宣传筹赈活动的历史意义与民族主义影响与演进的分析较少。

基于此，本文通过大量历史文献与歌曲文本等研究资料，将此访问活动焦点放置于民族主义之上，旨在探讨中日战争时期，中国艺术团在马来亚的文宣活动如何实现其筹赈目的，如何宣扬其政治倾向，如何建构、影响马来亚华人的华人民族主义，以及本土化如何切入、面对、消融与解构中国艺术团体造就的民族主义。在此基础上，其对于华人民族主义与本土民族主义的影响作用，二者相互融合与冲突的关系，对于马来亚英日战争时期华人的政治倾向的进一步影响，进而如何影响到日据时期的国家局面，马来西亚华人的民族主义走向，予以揭示。总体而言，本文以“武汉合唱团”为媒介，分析马来亚华人的民族主义与身份认同的变化，包含前期“武汉合唱团”民族主义的输入及其影响如何延续，本土民族主义如何生成，以及与马来亚华人后期抗日战争历史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本文亦提出马来西亚华人第一波、第二波本土民族主义认同基本完成的时间结点，并分析论述其如何影响到马来西亚历史的政治生态。此外，本文亦就缘何该团能够在马来亚的宣传筹赈活动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短时段的活动如何影响到长时段历史马中关系等议题，进行阐释。弥补现有研究之不足，以期备学界参考。

二、民族主义的生成与发展：“武汉合唱团”与抗战中国

本文以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关于民族主义与身份认同的研究为理论框架，在此意义上，民族主义被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运动，以获得和保持自治（autonomy）、统一（unity）和代表一个人口（population）身份，其中成员认为其构成一个实际的或潜在的国家。（Smith 2009: 61）民

族主义的核心概念，包括国家的真实性与真正的我们（national authenticity and truly ourselves），连续性与不易察觉变化（continuity and imperceptible change），尊严与发现真正的价值（dignity and discovery true worth），命运与历史的预定和精神的转化（destiny and predetermin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irit），依恋与“爱”（attachment and “love”），家园与讴歌、地契和祖传土地（homeland and extol, title-deed, the ancestral land）。（Smith 2010: 31-36）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提到，“民族主义是一个贯穿了整个近代中国史的主题。公平地说，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积极参与政治的中国人都 是民族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试图在现代世界恢复中国的尊严、地位和主权。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郑诗亮、孟繁之2014）在凯拉斯（James G. Kellas）的理论框架下，二十世纪前期中国民族主义可分三类，一是康有为的社会或文化民族主义（social or cultural nationalism），二是章太炎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三是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而受到前期的民族主义论辩的促进，中日战争期间，中国民族主义由前期的萌芽过渡至高潮，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高度重合，打破单一民族国家概念，国家内部民族矛盾、党际斗争、阶级对立成为次要因素，以救亡图存为要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

“武汉合唱团”是由夏之秋成立的原“武汉合唱团”因中日战争而滞留武汉的团员，自组成立。成团过程上，1937年10月，夏汉兴参加“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担任音乐组组长，改名夏之秋，意在警醒自己中国处在危急存亡之秋。1938年夏，夏之秋与周小燕、田鸣恩组织“武汉合唱团”，该团名由李豪提议成立，该团秉持“在联合青年同志运用艺术工具激发抗战情绪，并本斯旨从事国内外宣传，激发同胞爱国情绪，鼓励为国输将，并将敌人暴行及我军抗战英勇事迹公布于世，以增进友邦人士对我同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武汉合唱团六人抵星，尚有团员二十人约下月可先后抵星，将在星表演助赈，合唱团副团长黄椒衍对记者谈话〉，叶奇思2006：36）的宗旨。该团经冼星海、贺绿汀、沙梅、刘雪庵等名家指导，于武汉各地为难民募捐义演，进行抗日宣传。同年，

日军兵临武汉，武汉机关团体转移至后方。经董必武支持，夏之秋与滞留武汉的“武汉合唱团”部分成员，辞去职务，自筹经费转道马来亚，进行抗日宣传筹赈活动。“武汉合唱团”行前宣誓，全体团员不分上下，人人平等，一切收益交公，随时准备为国捐躯。赴马来亚“武汉合唱团”团员构成上，中国籍团员共二十八人，分别为：团长兼音乐股股长夏之秋，副团长黄椒衍，总领队陈仁炳，戏剧股股长兼常务会主席项堃，演讲展览股股长谢锦标，总指挥朱文化，总干事兼生活指导陈启蒙，会计股股长戴天道，文书股股长陈霞影，音乐股副股长田鸣恩，事务股股长王南溪，事务股副股长曾庆骝，文书徐仁宪，团员郑秋子、李书翰、索景章、黄昆玉、查光富、陈文仙、李杰、陈蔚、戴庐生、陈久芳、胡南珍，女高音团员周保灵、江心美、彭淑蓉，钢琴手团员潘雅莲。印度尼西亚籍团员一人，黄源尹。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团员名单或存争议，根据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称，“迨至武汉重新组织全团男女近三十人，故名曰‘武汉合唱团’。”（陈嘉庚1989：80）“武汉合唱团”宣传活动结束出版《武汉合唱团海外工作纪念册》则称，该团共有团员二十五人，是“一个以戏剧演讲歌咏作为宣传工具的青年工作团体”，于“香港、英属马来亚”工作，“募款总数国币一千余万元”。（武汉合唱团1940）而根据陈蔚（Chen Louisa Woo）口述史资料称，“我们一共有26个人，当时开始的有26个人正式的已经参加进去的。”（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1993：2）至访问期间，陈蔚称，“我们那时候，到新加坡的时候已经有28个了，因为26个当中有两个香港参加进去的，就是说郑秋子跟周保灵”（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1993：64），而后续团员亦有变动，“在新加坡的时候，田鸣恩去指挥。因为在新加坡的时候，还有两位，一个是朱文化女士，还有一个李书翰先生是跟我们武汉一起出发。后来新加坡演唱完了，他们3位退出了，回国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人做副指挥。”根据《武汉合唱团海外工作纪念册》提到的二十五位中国籍团员，与陈蔚回忆时提及该团解散时，“我们25个人——回去的时候25个人，28个人当中有3个新加坡已经离开了”（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1993：54），基本一致，故本文采用28人。在马来亚访问

结束后，李豪、郑秋子等部分团员选择留居马来亚，从事本土戏剧音乐活动。2020年2月29日，随着该团最后一位团员留港报人李杰辞世，享年一百零三岁，该团正式成为历史。李杰在世留港工作时，报社面临局部财政困难，因与“武汉合唱团”往事，华侨曾再度出资相助。（张茅2020）

“武汉合唱团”象征的中国抗战艺术团体发展，与中日战争战局发展变迁直接相关。这一发展历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期间艺术团体的发轫阶段，1937年至1938年“全民抗战”时期蓬勃发展阶段，1938年至1945年中日战争相持与战略反攻期间逐步从受到制约到再度发展阶段，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抗战艺术团体转型阶段。期间，对于“武汉合唱团”，晚近中国亦有较高评价。值得注意的是，相较当代中国对该团在马来亚的历史贡献更为关注而言，晚近中国对于其前期在中国本土进行的救亡宣传活动，亦有充分肯定。举例而言，刘雪庵等人创办1937年至1939年发行中国抗日音乐杂志《战歌》（原名《战歌周刊》）中评价，“武汉合唱团为此间民众歌咏团体中技术水准最高者”，而“其所唱四部合唱如《满江红》、《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歌曲，均极受听众之欢迎，并不时在市府电台广播救亡歌曲，亦获观众致欢迎拥戴”。

事实上，战时社会历史脉络流变不单体现在团体发展历程之中，同时表现在其音乐作品本身。基于与中日战争局势的密切关联，处于“国将不国”的紧要历史时空局势下，“武汉合唱团”民族主义形塑，具有较强危亡意识与民族共同体身份强化。具体而言，在该团访问马来西亚时公演曲目中，即选取受到1930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弃守东北的影响下，黄自、韦瀚章作词，黄自谱曲的《抗敌歌》：

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抗战将仇报。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意团结牢，努力杀敌誓不饶。

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文化疆土被烧焦，须奋起大众合力将国保。血在沸腾，气在豪，仇不报，恨不消，群策群力团结牢，拼将头颅为国抛，拼将头颅为国抛。

与韦瀚章作词，黄自谱曲的《旗正飘飘》：

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好男儿报国在今朝。快奔起，莫做老病夫，快团结，莫貽散沙嘲。

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好男儿报国在今朝。国亡家破在眉梢，挽沉沦全体同胞，戴天仇，怎不报，不杀敌人恨不消，快团结，快奋起，好男儿报国在今朝。

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中共）左翼文化阵线影响下产生的《义勇军进行曲》等。1935年12月9日，中共领导一二九抗战救亡运动爆发，北平学联和各界人士示威声讨“防共自治”，中国左翼民族主义抗日救亡热情达到高峰。1935年12月，中共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毛泽东〈论反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91：155）次年5月，中共《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1936年5月5日）的声明中，将“抗日反蒋”转变为“联合抗日”，“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在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1936年5月5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1978：62-63）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声明这一决策。中国国民党亦委派代表多次前往中共陕北瓦窑堡商讨联合抗日。然而，国共双方未直接达成一致。原因在于，1937年2月10日，中共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的实现与否，为两党关键分歧。同年2月至7月，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中国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多次就国共合作事宜进行磋商。事实上，因国共双方虽支持两党联合抗日，但是在两党如何“联合”上的主张则不完全一致——国民党一方期望通过“联合”“收

编”取消中共独立性，而中共则坚持保留组织上的合法性与独立性。（周恩来〈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0：192）在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加速侵华进程，华北局势危急。7月20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日军进攻之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27日，中共代表到达西安，当日即获得蒋介石口信，“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7月29日，北平沦陷。同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大战已起，深信委员长必能麾动大军，继续北上，保我华北，复我失地。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谨乞颁钧命，开赴前线，是为至祷。”7月30日，日军攻占天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蒋介石〈告抗战全军将士书〉（1937年），秦孝仪1984：217-221）8月6日，国民政府取消郭沫若通缉令，释放中共政治犯。8月25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誓师抗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一时期中国抗战音乐也出现明显的通俗化和全民化倾向，“武汉合唱团”马来亚访问时选取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即为这一时期的代表：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喊）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喊）杀！

在北平、天津沦陷后，蒋介石领导中国军队对日展开战略决战，即为八一三淞沪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最惨烈战役。然而，由于难以抵挡日军攻势，历时三个月，11月11日上海沦陷，13日国民政府发布《告上海同胞书》，12月13日南京沦陷。“平、津、沪、宁的文化人移向武汉，给武汉的文化事业带来了生机。”（毛磊1985：24）国共两党与各界文化人士集聚武汉，自此武汉成为中国抗战中心。例如1937年10月，洪深、金山、冼星海、王莹带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来到武汉，后者成为金

山、王莹带领的“新中国剧团”雏形。（钱彬彬、何启才2022：93-134）1937年12月，上海救亡演剧三、四队到达武汉。1938年7月上海救亡演剧八队到达武汉。³ 国共合作在武汉文艺工作上体现明显，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政治部，负责政治动员与宣传。陈诚要求政治部工作目的有三，“第一，提高军队的战斗精神，达到国家建军的目的。第二，组训全国民众，集中全国力量。第三，运用宣传力量，统一全国舆论，粉碎敌人的战意和野心。”（陈诚1938）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继承黄埔军队政工制度，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秦孝仪1978：178）政治部下设张厉生为秘书处秘书长（贺衷寒继任），赵志尧为总务厅厅长，贺衷寒为第一厅厅长，康泽为第二厅厅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何浩若、黄少谷继任）。1938年8月，周恩来、黄琪翔调职，张厉生、袁守谦继任副部长，1940年7月，梁寒操继任张厉生。1940年9月，陈诚调职，张治中继任部长。其中，第三厅在国民政府的管理下负责宣传，其主要工作有三，一是一般宣传工作，二是艺术宣传工作，三是对敌宣传工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38；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39）而在中共一方，周恩来指示政治部第三厅“上面的主要干部成立一个党小组，三厅下面的党员另外成立一个党支部，互相不要发生联系，万一发生问题，就不致相互影响。”（阳翰笙1986：179）中共领袖周恩来、“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任政治部副部长，是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重要体现。即，政治部第三厅既属于国民政府，又受到中共长江中央局指导，使之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实质性产物。⁴ 正如前文所言，处于抗日战争不利局面的历史时空环境下，国共两党团结一致，受此影响，“当时的武汉抗日救亡运动正汹涌澎湃，歌咏活动声势尤为突出”，“但即使是身临其境的参与者，也难以概述其磅礴全貌。为有助于窥测其轮廓于万一，尝一言以概之曰：‘五次歌咏大会，五个宣传周，六纪念日，三祝捷，三追悼，九次重要活动等。’”（曾昭正遗作，曾宪德整理2015：38）

1938年夏，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在武汉蓬勃发展，民族主义情怀达到高潮，“武汉合唱团”成立，即在这一时期。又因外部环境的不利局面，1937年11月，布鲁塞尔《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上，因自身利益关

切，苏联外各国未就中国“援华制日”提案给予支持。这一事件在中国对日战争不利影响之外，一定程度上，对于该团出访具有推动作用。一是，体现中国海外抗日宣传工作之迫切需要。二是，与苏友好关系加深，且武汉时期苏联对华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平井友义〈ソ連の動向：1933年~1939年〉，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1963：257-360）因此，于国共之上合作起到积极作用，使“武汉合唱团”出访成为可能。其三，国际社会在中日战争上中立态度，打破国民政府期望借国际力量制裁日本以解决中日战争的方针，使中国内部的“统一战线”更为坚定。而弃守武汉则是中日战局变化关键因素，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制定《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提出“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从新构成强韧阵地于浙东、赣西、皖西、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敌决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193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8：634）然而，次年6月日军进攻武汉，10月武汉沦陷。而原驻武汉抗日文艺工作者，或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撤至西南，或随中共转移至延安根据地，或因战争辞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正面战场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由此，1938年秋自武汉出发前往马来亚的“武汉合唱团”，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局面最为不利，救亡运动最为关键且高峰的时期。且处于国共合作密切期间，该团政治倾向性较弱，集中于抗日救亡与民族主义宣传之上。

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在马来亚期间“武汉合唱团”成员爱国意识强烈，将此鲜明民族主义意识传播马来亚华人，总领队陈仁炳在演讲中强调，“各位，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也是一个中国人，伟大的中国人，因为二十世纪当一个中国人的确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不是丢脸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武汉合唱团昨晚演唱观众拥挤，高总领事赠纪念旗一面，高氏并谓合唱团与营业艺术团不同，该团为履行救亡工作尽国民天职〉，叶奇思2006：70）而团长夏之秋“‘出国演出一年多，他却是像“叫花子”一样回来的。’夏兰青说，合唱团归国前夕，‘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曾向团员发放500元路费，但夏之秋将此款又捐了回

去。陈嘉庚得知后非常感动，为他手写了一张路条，叮嘱他在归途中，凡是遇到南洋华侨机工队的车，都可以凭路条搭乘。”（杨凯淇2014：1）

1938年9月“武汉合唱团”分为三批自武汉出发，经广州、香港、澳门等地辗转，12月24日全员抵达新加坡，进行马来亚访问活动。1940年3月该团结束宣传筹赈活动，4月返回中国。访问时间共计一年零四月，于新加坡举办演唱16场，柔佛州举办演唱22场，马六甲举办演唱10场，森美兰州举办演唱12场，雪兰莪州举办演唱18场，彭亨州举办演唱8场，霹雳州举办演唱34场，檳城举办演唱6场，吉打州举办演唱4场，共计举办演唱130场，发表演讲172人次。该团全部筹款所得，交由“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监管，由其直接寄往中国国内，“夏兰青告诉记者，合唱团在新马的巡回演出，在华人社会掀起了一股支援抗战的献金高潮，共募集叻币约230万（相当于230万美元），全部由‘华侨领袖’陈嘉庚所主持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保管，并转赠国内支援抗战。”（杨凯淇2014：1）

三、民族主义的输入与回应：“武汉合唱团”与马来亚华人

学界一般认同，海外华人的华人民族主义的生成与对中国的“祖国认同”，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向海外的由上至下的传散的过程。比如，王赓武、颜清湟等学者分析海外华人民族主义上的再华化的过程，是早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访问南洋时期就开始被建构和萌芽。基于此，能够证明，来自中国的宣传对于华人群体民族主义的确起到重要影响。而日本侵华与战时中国南来的艺术团体，则成为这股民族主义的强大催化剂。同时，民族主义作为混合了族裔血缘式的客观存在与文化或历史哲学式的主观建构的概念，就本土华人群体而言，这一概念是矛盾与多元的。即，马来亚华人的民族主义，具有相互融合与冲突的华人化倾向与本土化倾向。这一民族主义确受“武汉合唱团”等中国团体的跨境传播的作用，但在华人民族主义之外，也具有相互影响的本土化民族主义。

丰子恺曾言，“抗战以来，文艺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丰

子恺1938: 98) 置身于中国历史危机时刻, 远赴重洋的“武汉合唱团”以文艺作品为主导, 于马来亚的筹赈活动, 面临观众群体不同, 接受难度更大的宣传困境。基于一者国共政权的双重影响下, 二者标志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下, 三者武汉弃守的时局之下, “武汉合唱团”自身政治色彩并不强, 主要目的是进行抗日宣传。换言之, 其对于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输入, 主要采用的是以抗战音乐作为文化介入的方式, 相较后期来访的其他中国团体, 其在国共之间的政治导向性较弱。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 来自中国的戏曲歌咏作品逐渐转向大众化、民族化与现实主义方向, “抗战开始后, 戏剧思潮的发展, 主要面临两个问题: 一, 戏剧艺术如何进一步大众化、民族化; 二, 在创作上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发扬现实主义精神。”(陈白尘、董健2008: 287) 事实上, 以“武汉合唱团”为代表,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 民间外交(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多与日本侵华战争伤痛、中国民族主义宣传、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相互交叠。

“武汉合唱团”在马来亚的抗战音乐具有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和抗日现实导向, 但同时, 与本土华人的文化身份、政治认同等具有密切联系。其抗战音乐可根据类型目的划分为全民抗日、军民救国、日军劣行、抗日捐输、华人爱国与中华文明共五类。此处笔者以《赤子丹心——武汉合唱团南洋筹赈巡回演出纪实》(叶奇思2006) 为基础资料, 并结合相关时人历史文献、报章评论等资料梳理总结下图。需要提前说明的是, 在实际演出过程中, 该团在演唱本文列述歌曲外, 亦包含其他音乐。陈蔚提及, “不过在新加坡有几个晚上, 在维多利亚纪念堂, 我们演唱了世界的名曲, 有独唱, 有合唱, 都有, 成绩也相当好。”(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1993: 41) 据本文根据报章、档案资料整理, 除本文分析音乐作品外, 该团在马来亚亦有戏剧表演, 包括有《华侨与祖国骨肉情》、《放下你的鞭子》、《流亡到南洋》、《人性与兽性》、《中国万岁》、《回春之曲》、《三光政策》、《三江好》、《骨肉情》、《原野》、《日出》、《前夜》、《人性》等。同时, 因抗战音乐包含的主题存在不唯一性, 此处本文主要以歌曲表达的首要关切与时人的整体感受为原则进行归类, 避

避免因“一曲多类”而使分析流于浅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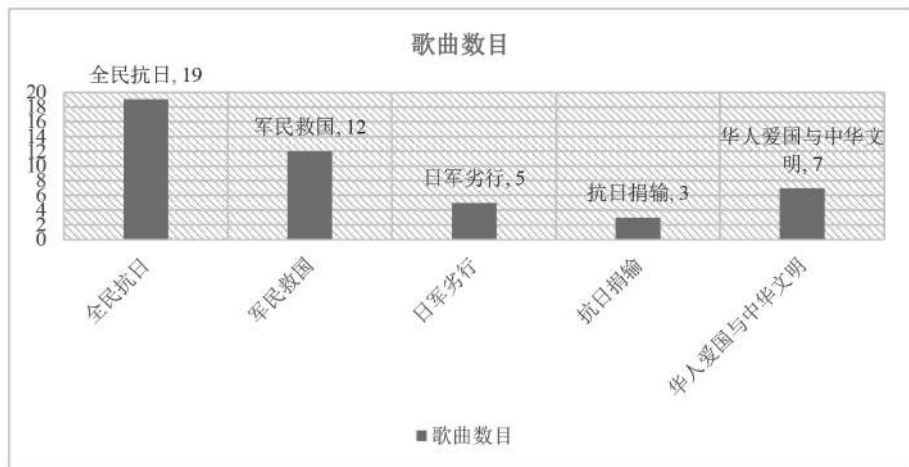


图1 “武汉合唱团”抗战音乐类别整理

全民抗日类型的抗战音乐是“武汉合唱团”宣传筹赈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具有影响力的中华民国（1912-）国旗歌《青天白日满地红》、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及《焦土抗战》、《青年战歌》、《打回东北去》、《保卫中华》、《女青年战歌》、《热血歌》、《冲锋号》、《奋起救国》、《抗敌歌》、《生死同心》、《全国总动员》、《抗战到底》、《秋风凉》、《前进》、《锄头歌》、《淮河船夫曲》、《玫瑰三愿》。

而军民救国类型的抗战音乐主要包括《救国军歌》、《满江红》、《游击队歌》、《上前线》、《旗正飘飘》、《新生命》、《游击进行曲》、《枪口对外》、《杀敌歌》、《大刀进行曲》、《歌八百壮士》、《巾帼英雄》。

日军劣行类型的抗战音乐包括《认清敌人》、《保家乡》、《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松花江上》、《长城谣》。

而抗日捐输类型的抗战音乐则有《募寒衣》、《赠寒衣与前方将士》、《踊跃捐输（抗敌募捐歌）》。

华人爱国与中华文明类型的抗战音乐包括《流亡三部曲（第二部）》、《安全土》、《思乡曲》、《四季歌》、《卖花词》、《玉门出塞》、《美哉中华》。

总体而言，“武汉合唱团”在马来亚的抗战歌咏选择上，主要有二，一是在中国已取得成功并且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二是能够唤起本土华人中国民族意识“遗绪”以促进华人为中国抗日活动踊跃募捐的作品。以《思乡曲》为例：

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一夜里炮声高涨，火光布满四方。我独自逃出了敌人的手，到如今东西流浪。故乡远隔在重洋，旦夕不能相记忘，那有我高年的苦命的娘，盼望着游子返乡。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

在“武汉合唱团”访问马来亚期间与中日战争时期，马来亚华人对于该团到访，态度上尤为热切，积极献金捐款。根据夏之秋之女夏兰青的回忆，夏之秋在世时，时常忆及“武汉合唱团”在马来亚演出时的盛况，“有的人捧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大叠钞票，有的人掏出身上仅有的现金，老人们拿出包了又包的积蓄，孩子们献上几枚硬币，还有人将自己身上的金镯子、金项链、金耳环摘下来往台上扔。”（杨凯淇2014：1）

运用群体传播学理论，能够解释“武汉合唱团”访问马来亚期间，对于本土华人民族主义的影响。在群体传播学视阈下，群体是具备共同目标和归属感，存在互动关系的复数集合体。（见田宗介、栗原彬、田中义久1988：439）而群体传播则是将群体的共同目标和协作意愿连接和实现的过程。（见田宗介、栗原彬、田中义久1988：440）“武汉合唱团”抗战音乐的传播，促进了本土华人的华人民族主义与群体意识形成与固化，而群体意识又作用于群体之上，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在该团演出期间，根据李豪的回忆，“当时的星马人士的热爱抗日歌曲以及慷慨捐款的热潮，比战场上的士兵的作战气概还要激烈，热炽。为了工作，我只能在周末和假日去欣赏他们的演唱，也欣赏到人潮的热情——那歌声、掌声、欢呼声的

共鸣效果。也看到了愤怒、希望、欢乐、恨与爱、热情的、可贵的泪光。我受到感动，我深深的被感动了，最令人感动的是，见到不同阶层的人们，统统被感动了！”（李豪〈武汉合唱团创组的经过〉（1971年），许云樵1984）而本土侨领对于“武汉合唱团”的回应同样展现其民族主义的倾向，例如，林金殿倡议，“希望我全海外华侨，能于最近向中国政府要求实施一项法令，如凡华侨存有产业现款于中国和外国银行者，应将其全数中二十巴仙捐献国家作为军费，最后希望吾华侨精诚团结，勿做意气之争，共为国家民族后盾，争取最后的胜利！”（〈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华侨富商应以全部资产二十巴仙捐献国家充军费，林金殿氏并谓抗战以来富豪捐献为数不多〉，叶奇思2006：141）而李振殿表示，“中国乃吾人之祖国，现虽寄居海外，但终需归国……望吾侨尽量捐输，方不愧为我黄帝子孙，方不愧为中华民国之国民。”（〈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武汉合唱团演唱第二十六晚，国内民众杀敌侨胞理应输财，此时不输财他日回国必感无限羞愧〉，叶奇思2006：153）

音乐促进“群体归属意识”生成，具有维系“群体感情”作用。群体传播的主体与客体对象具有“互融性”，即，传播者与受众的身份界限不是明确的施动与受动关系，在一定层面上，受众同样具备传播者的作用。马来亚华人并非单纯被动接受“武汉合唱团”抗日音乐输入，而是积极参与其在地传播，增强华人民族主义意识与抗日救亡的群体感情，“据说武汉合唱团的演唱，从不选择地点，全由各地筹赈会安排行程，不论大小市镇，从未拒绝上演。有时在已演唱过的地方，再次受到热情的重演邀请；更有多位抗日歌迷追随该团北上，天天听歌，场场学歌，学会了好些易于上口的大众歌曲，也在台下相应合唱起来哩！”（李豪〈武汉合唱团创组的经过〉（1971年），许云樵1984）

“武汉合唱团”在马来亚公演以歌咏为主，也有少部分话剧，包括由《放下你的鞭子》所改编的《逃难到××》（此处为所到之处的名称），以及《三江好》、《雷雨》、《前夜》等，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等。“无论到哪里演出，合唱团总是带着自己印制的歌片儿，分发给观众。每次演出结束时，合唱团带领全体观众一起高唱抗战歌曲，台上台下融为一体，

同仇敌忾，情绪高涨。演唱结束后，观众踊跃捐款的场面让团员们感动不已。……一位朝不保夕的老年乞丐当场拿出很多铜板，非常气愤地说：

‘这是我的棺材本，捐给日本人钉棺材……’在吉隆坡义演时，一位名叫陈永的富商，不仅几乎每次都带领全家大小到场观看演出，而且独自捐了一架飞机。”（刘楠楠2017：81）中国抗日战争基础是民众，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亦由民众发起，而“武汉合唱团”出访马来西亚，处于中国抗日思潮最为勃兴阶段，不分党派，不论新旧，一致抗日。由此，抗日战争成为中国全民族国民性的集体行为，具备取得马来亚华人认同的先决条件。而作为民众与民众的连接，其在马来亚的民间外交活动，使抗战音乐成为激起同宗同源、同仇敌忾的时代旋律。例如，郭鹤年曾回忆“武汉合唱团”在马来亚演出时的动人场面与广泛支持，因其看过多场演出，与夏之秋成为好友。（郭鹤年〈武汉合唱团〉，郭鹤年口述、Andrew Tanzer编著2017：19-28）由此，秉持一致抗日的主张与民族意识，该团能够最大限度的组织起民众，本土华人群体以回溯原乡抗拒在地异化，而因马来亚华人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使“武汉合唱团”的演剧过程中，其抗战音乐内容亦有所改编转化。这些与本土华人生活实际情境相结合的艺术作品，造就了抗战音乐在马来亚地区的风靡，“其中的《逃难到星洲》改编自《放下你的鞭子》，该剧讲述的是中国北方发生战事，百姓流离失所，一位老人带着三个女儿逃难到星洲（新加坡）以卖艺为生的故事。因大女儿饥寒交迫晕倒在地，老人怒而殴打其女，旁观青年上前喝止，了解其为父女之后，痛陈今日人民之不幸乃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造成。随着剧情的发展，舞台上凄婉动人的歌声响起‘……冬季南洋暖如常，棕榈树高，豆蔻香，爹娘苦儿各一方，今后流浪到何方’，在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武汉合唱团在南洋出演此剧目，每到一地就将名称改成当地地名。”（崔婕2020）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武汉合唱团”在马来亚宣传访问活动并非一帆风顺的，尽管该团以团结抗日为第一要义，但亦面临源自团体内部的矛盾与冲突。虽然，其在马来亚的抗战意识与民族主义的输入成效明显，且得到了国共双方的共同支持，并对于国共两党产生积极意义，然而，国共之间的分歧与本土华人不同的身份认同，仍对该团访问活

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积极性上，中共方面，“武汉合唱团”访问马来亚，为中共发展与海外影响提供机遇，而同时香港中共党员支持、帮助该团出访。以这一出访为媒介，中共的影响亦辐射至马来亚，“合唱团临出发前，董必武派人送来了延安军政大学学生们生活、学习的照片，请他们在海外进行宣传。并交给他们一封信，请香港地下党的同志对合唱团的工作给予帮助支持。郭沫若主持的第三厅，也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嘉奖。”（宁静1992：64）事实上，该团在马来亚为中共打开外宣尝试的突破口，取得较好反馈，在此类中共外宣活动促进下，中共发展获得物资上的援助，举例而言，“一九三九年二月底，‘南洋惠侨救乡会’在吉隆坡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把向华侨募捐款项的百分之四十献给新四军、百分之四子献给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百分之二十作为惠州难民救济费。”（毛磊1985：227）并在访问期间，1939年9月12日，该团曾到访具有“小延安”之称的，1936年至1939年发生数次煤矿工人罢工运动的雪兰莪州煤炭山，即，马来亚共产党（马共）建立马来亚首个“苏维埃”工人议会所在地。而在中国国民党一方，同样支持“武汉合唱团”工作，该团筹款所得交由国民政府用于抗战。根据陈蔚回忆，该团的工作是已经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董显光“那时候都已经接头好的”，“那么蒋夫人也赞助，蒋夫人自己亲自欢送我们的茶会里边，她都知道我们的目标，也就非常赞助我们出国。”（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1993：66）

但是“武汉合唱团”同样面临来自团体内部与国共关系影响，以及马来亚华人群体不同的民族主义认同的作用。虽然整体宣传筹赈活动，“我们就像是一批孩子跟着大哥哥，大姐姐这样，已经有安排好”（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1993：40），然而处在特殊的历史场域，不同的政治立场亦影响到其宣传活动，陈蔚提到，“那个时候……当时也有一点问题，我想我不方便随便的批评。”（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1993：35）而在这一历史时空背景下，政治倾向的区别产生内部矛盾，“那么在这个28个人当中，大家从来不关心政治，因为我们年纪也很轻，对政治也没有兴趣，也不认识。惟有陈仁炳先生，他比较对政治有一点……可以说是有一点野心”

(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1993: 65), 因此夏之秋“从香港工作开始, 他因为受到领队陈仁炳先生的嫉妒和压迫, 竟然在某一个晚上, 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离团走出去了。……此后, 他一直都受领队的气。他也气得心脏很……急剧的跳动。我看他指挥的时候, 常常会把指挥棍放下来, 我就看着他闭着眼睛, 我知道他心又再跳了。……等到1940年的1月当中, 在马来亚霹雳州的红土坎演唱完了, 演唱完就是演讲。在演讲开始之前, 他又被陈仁炳气得第二次离开。……也是为了这个事情之后, 陈仁炳煽动团员们, 设法想驱逐我跟陈霞影离开团体。”(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1993: 113-114) 马来亚华人在民族主义认同上亦存在区别, 体现在对于该团的不同回应上。以李孝式为例, 陈蔚回忆, “这位先生对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因为我们在吉隆坡的时候, 我们去向他捐钱, 告诉他祖国给日本人现在侵略, 希望他能够帮祖国捐一点钱买枪炮、买子弹、买飞机去保护祖国。这位李先生回答我们说——对我们代表说, ‘我的祖家在伦敦!’ 那个时候我们敢怒而不敢言, 因为他是侨领, 我们好像叫化子一样, 去讨钱一样的。”而在回返中国的途中, 陈蔚曾再遇李孝式,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 ‘李先生, 你到祖家去, 你的祖家在伦敦, 你搭错了船。’ 我说: ‘这个船是到中国去的, 是到我们的祖国去的。’ 我这个话是不应该这样讲啦, 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年轻, 但是也是心里面很气的, ‘你的祖家在伦敦, 现在你为什么要回祖国啊?’ 所以我就这样跟他回答去。”(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1993: 87-88)⁵

四、民族主义的影响与延续：马来亚华人与日军入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与“武汉合唱团”等南来中国抗战歌曲相关联, 同时与马共的发展相联系。而民族主义的发展, 不单在历史发展脉络中体现, 亦展现于歌曲本身。举例而言, “据1939年11月27日本地《总汇报·文会》曾登出歌剧《台儿庄》(安娥词任光曲)之目录, 《空中哀歌》即列为第7首, 女高音唱; 原歌词‘弟兄’改为‘同志’、‘中国’改为‘马来亚’。”(槐华2013: 4)

马来亚华人抗日运动历史发展在太平洋战争前已零星存在，主要由于彼时马来亚华人多保留“侨民”身份与意识，受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而随着中日战争过程中，日军对中国的逐步占领，马来亚华人抗日活动逐步发展，并与筹赈中国双轨并行。而正如前文所论，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随着中国全面抗日与民族主义情感达到高峰，马来亚抗日运动逐渐组织化，建立了较多抗日援华组织。以“武汉合唱团”为代表，来自中国的民族主义输入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马来亚本土民族主义意识生成，募款期间，陈蔚回忆，“马来西亚我觉得更踊跃，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出来做的工作的情况，他们已经知道了。因为新加坡4个月里边，成绩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不是完全是捐款一项，而是好像我们所演出的戏剧，我们所唱的歌使他们非常的感动。他们也认识到真正日本人快要来的一种现象。”（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1993：41）事实上，二战是新马华人身份认同转换的重要契机，并与马来亚英占、日占时期历史发展与当局国策密切相关。

首先，就中日战争而言，早期英国政府在中日战争上采取“中立”政策，对于中国来马抗日筹赈团体以及马来亚本土华人抗日援华活动，则以“默许”的方式予以支持。根据陈蔚回忆，英国政府对于该团“他们完全没有什么……也不赞同，也不赞助，也不反对，他们就是随随便便。好像有高凌百总领事在那边管，那边有筹赈会。这个到以后就有了，以后我们得到另一位英国的长官，的确确帮我们团体做了一番事情，这个以后的事情。”（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1993：33）但是，基于日军攻势逐步扩大，占领中国南部省份，对英属香港与马来亚构成威胁。英方在马来亚加强军备的同时，也积极寻求英日妥协的方式，谋求日军北进苏联，保全英属殖民地区。因此，1939年，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受到一定影响。而英国政府这一态度上的转变，同样影响“武汉合唱团”，叶奇思提到，“武汉合唱团在星洲演出……但进入马来亚境内，除在吉隆坡演过大型剧‘原野’外，独幕剧只能演‘逃难’等极少的剧目。1939年6月23日合唱团日记里记载芙蓉英殖民地政府对该团演出的限制法令：……演出时不准演说，……演词中，不许含有抗日及抵制日货之词；……会场

必须井井有条，不许用任何方法激动观众爱国情绪及抗日的空气……”

（叶奇思2006：5）其次，就英日战争而言，二战期间日本具有较强的战争野心，同时日本军部对战端、战势的分析部署周密。（Ministry of the Japanese Navy 1938; Australian Army Research Centre 2018）日本军部于1941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12日南侵英属马来亚。1942年1月11日，日军占领首都吉隆坡，31日，攻占全部英属马来半岛，2月8日持续至15日，英日开展新加坡保卫战（Battle of Singapore），英方战败。（Mandatory Community Meeting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1942）丘吉尔称该战争是英国军事史上“最严重的灾难”（worst disaster）和“最大的投降”（largest capitulation）。（Churchill 2002：518）由此，在马来亚的英日战争，极大催生发展马来亚华人的本土民族主义，即以马来亚而非中国，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

事实上，中日战争时期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歌曲，多来自以“武汉合唱团”为代表中国南来艺术团体，内容与中国时局相关。麦留芳研究指出，“当这些歌曲由中国的歌剧团带到海外时，为华侨提供了‘国家认同’的动力。不幸的是，这个认同却因中国国内的豆萁煮豆的行为，其之剧烈、快速、多端必然使到华侨无所适从。这种认同的失落，便在他们后来不择歌曲而唱的行为上表露无遗；这便是虚拟认同的一种。除了恒常脐带文化外，个人的经验与歌曲中所言之事物及人物，并没有实质上的关联。”（麦留芳2012）换言之，因来自中国歌曲具有不同国共意识形态，且后期来自中国的艺术团具有国共不同主张与目的，而又因是否具有原乡的社会与经济联系，第一代华人具有真实的认同，而对于以第二代华人为代表的马来亚华人，其对于“中国”的片面认识与身份上的认同，使之对于“中国”的认同与其自身和中国真实的历史处境相差别，“中国”则成为由主观想象引导的同一种的“虚拟认同”（virtual identity）。至英日战争期间，随着马共发展与英日战争局势危机，由马来亚本土反殖民意识与抗日需求形塑的本土民族主义，则带来了新的音乐内容。

受到“武汉合唱团”与日军南侵影响，马来亚本土产生较多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抗战歌曲，在南太平洋战争日本入侵英属马来亚期间，马来亚

本土华人的抗战歌曲基本以马来亚作为认同对象，而在语言和风格上则带有早期中国南来歌曲特征，例如，“文工团青干班白天听课、唱班歌（借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改了词，‘/’后为原词，如‘星/黄河之滨’、‘卫/救’、‘马/国’）”（槐华2013：5）。因马来亚日占时期日本政府政策影响，此类歌曲多以手抄或油印方式传播，在激励华人保卫家园同时，亦在形塑具有民族主义与家国共同体意象的“马来亚意识”萌芽。

马共在本土民族主义生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英日战局紧张背景下，1941年12月18日，英国政府承认马共为合法政党，释放在押马共人士，进行武装训练，联合保卫马来亚。而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委任陈嘉庚为“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主席，委员会下设“民众武装部”，马共党员林江石为主任。而武装部成立的第一星期，即有三千名华人报名，而后增加至一万人。（罗武1982：20）1942年2月1日，马共通过武装部，组织成立星华抗日义勇军，赴各地驻军抗日。（〈星华义勇军血战经过〉，许云樵1984：226-228）2月13日，英国政府解散星华抗日义勇军，15日，新加坡沦陷。岛内各州沦陷之际，马共以受训义勇军成员为基础，动员群众收集英军武器装备，组织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1942年1月，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二、三独立队在雪兰莪、森美兰、柔佛成立。日占期间，在“老队”的基础上，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扩建“新队”，共成立8个独立队，合计67个中队，有九千九百余人，加上后备队、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共计四万五千余人。（广州新马侨友会1922）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日军进行的战斗约三百四十余次，消灭敌人五千五百余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总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战记〉，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1947：27-31）同时，除左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外，亦有较多受英国政府、中国国民党支持，以及马来亚华人自行成立的抗日组织，例如，1942年4月8日，中国国民党马来亚支部在吉兰丹、霹雳、彭亨地区成立华侨抗日军，由林志良领导，设有4个独立队。（李业霖1996：211-213；《马来亚华侨抗敌军上国防部呈》1946年2月21日）以及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与英国政府经济作战部合作组织一三六部队，成员为来自新加坡的闽籍

华人，受训后潜入马来亚，截取日军情报。（《中央党部海外工作人员名册》1943年9月18日）1943年，郭益南在沙巴成立的客家华人组织“神山游击队”（北婆罗洲华侨抗日军）等。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为代表的抗日组织得到本土华人支持，以1941年《保卫马来亚》，1942年《新加坡河》等歌曲为例，先前的文化乡愁转变为歌词中带有的马来亚独特的历史社会自然风貌，构成这一时空脉络下的本土化意向。专注于国族打造，带有热带地方性风格成为“保卫马来亚”的政治符号，使之形成一个基于国家疆域，而不基于族群移民历史的，不基于血缘、民族、宗教与文化背景的“想象的共同体”。虽然在文化、思想与用语上未完全舍弃中国南来歌曲影响，但是在国族建构、身份倾向上则有明显的本土化转向。

1941年11月杨果作词，杨励作曲的《保卫马来亚》：

南太平洋上，海涛在翻腾，法西斯强盗带来战争。
从北马边境，到南马之端，遍地是受难者的呻吟。
多少的生命，多少的财产，在枪火中毁灭净尽。
广阔的城市，恬静的乡村，到处发出反侵略的呼声。
团结起来，马来亚人民大众，为自由解放斗争。
誓死保卫马来亚领土完整，打倒黑暗迎接光明。

1942年4月，墨尼作词，叶立天作曲的《新加坡河》：

暮色下新加坡河，悄悄地流，黯黯地诉。
你可知道多少惨泪冤血，滴入你的心胸！
妻子幻见郎的血尸，孩子梦见惨死的爹娘，
椰园忿歌，铁石暴跳，谁能禁住这怒火，这怒火？
谁愿听，野兽吃人的歌颂英勇？谁愿看，自谓仁慈的血刀灼灼？
你呵！新加坡河，怎愿更多的血泪，来滴碎你的心胸？
激荡怒吼吧，人民挣扎反抗，挣扎反抗！

五、民族主义的本土再造：马来西亚华人与族群政治

在身份认同因素外，民族主义的影响与战争、文化的历史记忆密切相关。前期的马来亚的反殖民运动和民族主义意识建构一脉相连，共同构筑起后期的马来西亚的国家想象。民族主义不仅影响到马来西亚华人，同时也影响到了马来西亚历史发展本身。中日战争时期在马来亚，“武汉合唱团”带来了抗战音乐，而在此民族主义输入的作用下，马来西亚华人形成具有民族性的历史记忆。1943年，英国政府成立马来亚联邦部，用于维系英国在新马的切实利益与研究战后改革计划。（Ongkili 1985: 38）1945年，日本战败，英国政府重新获得马来亚控制权，1946年，英国政府提出马来亚联邦计划（Malayan Union），期望以间接统治与赋予普遍公民权方式，巩固权力并以“属地主义”塑造国家认同。（崔贵强1990: 156）事实上，马来亚华人在这一时期多处于多元认同状态，即具有“属地”认同，同时亦具有“血缘”认同，对于英国政府提出以普遍公民权取消双国籍政策，中华民国则以不支持亦不反对态度处理，未承认其失去中国国籍。基于此，英国与中国当局的举措，强化本土华人的身份认同意识。然而，马来亚联邦计划招致马来族群反对，在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成立的背景下，英国政府放弃这一计划，代之马来亚联合邦宪制。1947年，陈祯禄等拟定具有马来亚民族主义，即国族主义认同的《人民宪章》，组织罢市行动，未得到英国政府认可。由此，马来人特权得到巩固，华人等非马来族群权益受到影响，马来亚成为“马来人的马来亚”（崔贵强1990: 160）。而为应对马共武装斗争，1948年英国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时期，并支持1949年陈祯禄成立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华公会）（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执行“新村”政策，马共生存空间受到限制。时值中国国共内战，国共两党在东南亚具有各自的宣传组织策略，其中，原上海抗敌演剧五队、七队组成的“中国歌舞剧艺社”曾南来马来亚，“从吉隆坡开始，而芙蓉，而巴生，而加影、怡保、布先、太平又回到新加坡，十个月又演了二百余场。其中除在吉隆坡、槟城两个较大的城市停留时间较

长外,其余地方停留都很短。”(郑达1986: 43)据吴继岳回忆,“‘中艺’离开曼谷快40年了,知道最初该社在星、马公演受到比泰国更热烈的欢迎,该社在星、马和在泰国一样,也一面公演,一面开办歌舞训练班,且吸收了不少青年新社员。”(吴继岳1986: 12)事实上,较之“武汉合唱团”更富民族主义色彩,二战后至冷战时期,到访的国共团体则更具政治立场。离散华人族群的身份认同是“弹性选择”与“碎裂认同”,即在地华人与祖国是若即若离的关系,同时保有与在地的联系。(Ong 1999)而就马来亚本土华人而言,日占时期直至五十年代,多元身份认同逐渐成为本土华人认同的主体。

马来亚本土华人音乐体现这一复杂意识,一者,关于华人民族主义认同,例如,于国共内战期间红苍作曲《五更叹》歌词载,“听说鬼子投降自己打自己,打了个胜仗没归家日”,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1949年10月9日华侨中学学生自治会发起‘庆祝新中国诞生晚会’(主席冯以东),升五星红旗,唱《义勇军进行曲》。友校南洋女中歌《达坂城的姑娘》、跳《秧歌舞》,华中自治会则合唱《美丽的祖国》,最后各校齐唱《民主青年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槐华2013: 13)二者,随着国家历史进程,马来亚华人更为积极的介入在地生活,音乐创作亦具有强烈的在地化情感。英国政府1951年出台《巴恩报告书》(*Barnes Report*)及次年通过的《教育法令》等,引发本土华人反对,而华人的抵制亦使英政府不满。(Oong 2000: 184)自1955年东姑当局与英国就马来亚独立谈判,1957年获得独立。公民身份与政治权益上,1952年颁布修正公民权条例,1952年马华公会与巫统组成联盟,1955年中国取消双国籍政策,1956年推出《拉萨报告书》(*Razak Report*),1957年修订《教育法令》,特别在国家独立的多重背景下,华人国家认同发生转向。在民族主义本土再造的阶段,因当局对共产主义的围堵,双国籍政策的取消,使在地华人必须作出抉择。回归中国不再是马来亚华人唯一选项,本文提出,华人认同的本土转向,第一波高潮即在五十年代中期。例如歌曲《我们的声音》、《马来亚繁荣进行曲》、《马来亚到处都是阳光》等,以1956年莫泽熙作曲《胶林,我们的母亲》歌词为例,“带着热烈的爱

情，我漫步在辽阔的胶林，壮硕的胶树，排着整齐的队伍，青绿的胶叶，轻轻地翻滚，啊，那噼噼啪啪的声音，是胶林播种的讯号……我爱这伟大的胶林，胶林是我们亲爱的母亲……啊，今后祖国需要我，我更不能离开胶林。”（杜青2009：142）而这一时期，马中关系是辩证复杂的。具体而言，或因当局对本土华人原乡情感与民族主义意识夹杂政治考量；或因冷战背景下，作为多民族宗教国家对共产主义的不信任；再或因有鉴于国共内战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建立，及当局同马共的政治角力，因此这一阶段当局对于共产主义中国态度与表述复杂，影响本土华人的民族主义认同。由此，家国情感与务实考量促使多族群共同的马来亚民族国家认同形成，本土华人逐渐转向为在地认同。根据廖建裕的回忆，“在五十年代末期到六十年代初期，作者在南洋大学受教育。在南大的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的学生都称自己是马来亚人。《我爱我的马来亚》是当时南大生最喜欢唱的歌曲。”（廖建裕2020：75）

基于此，虽以“武汉合唱团”为代表早期民族主义输入与独立后的马华社会亦有所互动，然而与前期中日战争及马来亚日占时期相比，这一互动极为有限。然而，身份政治问题在独立后延续，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当代马来西亚华人面临的难题之一。马来西亚族群分界问题是自殖民时期马来亚英国政府“分而治之”政策之始，而成为马来亚/马来西亚后殖民时期的继承和延续，固化本土民族优势地位的殖民遗产（colonial legacy）。

“再者，在一个由殖民者所精心建构的‘种族政治系谱’以及高压的政治手段下，‘种族’作为唯一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族群属性一旦被挑起，就会往初始情感化的路上走。”（林开忠1999：172-173）诚如前文，马华民族主义转向与国家独立息息相关。根据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民族主义发展类型理论，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发生于二战后原殖民地国家取得的接续独立。（Anderson 2016）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即于此民族主义浪潮独立，1963年马来亚（Malaya）与砂拉越（Sarawak）、沙巴（Sabah）、新加坡（Singapore）组成马来西亚（Malaysia），因新加坡华人主导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与马来人主导的巫统间的政见不

合，1965年新加坡独立。马来西亚现代历史发展具有民族主义因素。

这一阶段，马来西亚长期由国民阵线（BN）执政。国阵有13个成员政党，以巫统为核心，占内阁与国会议席的多数。308大选前，国阵以族群划分为主政治政策，如马来人政党巫统、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印裔政党马来西亚印度国民大会党（Malaysian India Congress, MIC）等，即为族群政治影响的体现。因巫统给予马来人“特别地位”使华人与印裔等少数族裔获得公民权的施政策略，对于非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公民而言有失偏颇，因此纷纷走向在野党。巫统政治体系，一些学者有半民主体系（semi-democracy），（Case 1993: 183-205）伪民主体系（pseudo-democracy），（Case 2006: 29-48）非自由民主体系（illiberal democracy），族裔威权民主（ethnic-authoritarian-democratic state）（祝家华1994）等指称分析。事实上，族群关系紧张是多元族群国家社会稳定的不利影响因素，而民族的、族群的表述似乎融汇在马来西亚历史发展进程。根据内政部的统计，1945-1957年马来亚/马来西亚共发生17次族群对立事件。

（Kementerian Dalam Negeri 1988: 46）而在1969年发生大规模族群冲突513事件后，族群关系一度成为敏感议题，马来西亚政府与各族公民对于维系良好的族群关系更为重视。1970年敦拉萨上台后，实行“新经济政策”

（New Economy Policy）以财富重新分配在经济上优惠马来族群，次年提出的“国家文化政策”，（Abdul 1995: 7）则在文化上将马来民族文学确立为国家文学。这一时期，因被动成为在地“他者”，华人原乡情感加剧。中苏对峙期间，中国在共产主义阵营对外交往受挫，积极寻求建立非政治性盟友伙伴关系。基于此，1971年“银星艺术团”到访马来西亚，其公演音乐如《征服大自然》、《我是个石油工人》等体现的左翼意识形态色彩，使本土华人左翼思潮复苏，同时影响华人的文艺创作方式，催生马大华文学会“春雷文艺大汇演”等。（钱杉杉、何启才2022: 289-334）实际上，这一影响体现在复刻文革时期中国革命文艺概念与马华社会现实结合之上，而非在于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之上。此后，马中一系列民间互访活动，促成1974年马中建交，而本土华人面对马中是相互区别国家的客观事实，逐渐深化属地认同。而相关悼念马来亚华人在反帝反殖过程英勇

事迹的歌曲创作，则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化遗产，此外，亦有与族群政治运动与“灭灰灭黄”社会运动相结合的本土音乐创作。例如1983年，槐华作词、黎华作曲《柴船头》，“柴船头，柴船头，曾经是英雄出征的渡头，军号吹响人民抗日的心，抗日的心。”（槐华2005：235-236）

当代马来西亚社会，多元族群共存，晚近中国的民族主义影响式微，早一辈马来亚华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而新生代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则转向本土情感。现在与该团相关的当代马来西亚资料，以历史性回忆文献为主。而在相关文献中，“武汉合唱团”及其歌曲，主要作为表明本土华人光辉历史的例证，或是历史记忆与现代社会互动而使用的，“1984年秋，夏之秋与阔别多年的南洋著名书法家潘受在北京重逢，为纪念武汉合唱团的一段往事，潘受挥毫泼墨，题诗一首：‘狂寇江山半壁颓，图存必胜是兵哀。鸡鸣海外天如晦，一片歌从武汉来。’同时，描绘了当初为募捐寒衣二人所做《卖花词》之事：‘谱将战斗流离曲，曲曲秋声壮且悲。我亦偶然成附骥。满街儿女卖花词。’据潘受回忆，1939年‘南侨筹赈会’动员南洋地区中小學生将花纸和铁丝扎成纸花，于各种抗日纪念日期间沿街叫卖为抗战筹款，时任陈嘉庚秘书的潘受由此作词《卖花词》，夏之秋听闻深受感动，大哭一场，为其谱曲。‘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自由之花呀！这是解放之花呀！买了花救了国家！’歌声被学生们唱遍南洋的大街小巷。”（崔婕2020）而这一阶段马来西亚相关资料的主体，亦多为本土华人，而非“武汉合唱团”本身，且以回忆记叙历史事件为主，民族主义色彩较少，例如郑昭贤的《麻坡热血沸腾》一文等。究其原因，在客观因素上，“武汉合唱团”访问时间不满二年，且中日战争以来中国旅马团体并不唯一，访问目的亦不相同，距今久远，且有关“武汉合唱团”现有研究报道较少，因此当代马来西亚华人对于该团了解程度较低。而与上述客观因素相较，这一互动日趋减弱的关键原因则在于主观因素，即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转变。

本文提出，华人认同本土化的第二波高潮发生在九十年代。马哈迪政府采用文化开放（cultural liberalism）的怀柔政策，建构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马来西亚民族”（Bangsa Malaysia）作为施政目标。基于此，以华

人为代表的非马来族群危机意识缓和，国家民族身份认同进一步深化，基本形成族群共治的和谐关系。基于此，一方面，确立本土意识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更为审慎对待二战期间带有华人民族主义倾向的文艺作品。另一方面，诚然此类歌曲与当代马来西亚华人保持距离，但是，基于“武汉合唱团”等战时团体的访问，马来西亚与中国获得在当代更多的民间交往的深化方式和独特动因。据中国新闻社报道，“多年以后，‘中央乐团合唱团’访问马来西亚演出时，再一次将夏之秋的多首抗日题材音乐作品带到了侨胞身边。”（杨凯淇2014：1）对于这一阶段马华民族主义本土化过程，苏颖欣指出，当代马华主体建构分三个阶段：1980年代以文化寻根为名进行文化再创造为实的“传统发明”阶段；1990年代本土华人强调独立主体的“去中国性”阶段；2000年代以公民主体取代华人主体的“公民转向”阶段，但在各阶段，华人主体性身份的建立皆是在相对于“他者”之上。（苏颖欣2019：148-171）

基于此，当代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已完成民族主义由中国向在地转化，而受到“武汉合唱团”影响的马来西亚华人革命歌曲，则渐渐隐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然而，基于马来西亚历史中多元主义没有让位于同化，民族政治也没有让位于多元种族主义，（Harper 2009：2）当代马来西亚社会依旧存在复杂的族群关系纠葛。在马来西亚华人层面上分析，一方面，就马来族群而言，或因对于南来的华人群体这一非本土公民身份的移民历史追溯，又或因华社对华校、华团、华报、华教的坚持，以及由于华人沙文主义（Chinese Chauvinism）的发展与媒体的渲染，再或因华人拥有的经济优势，中国的发展与对华人的支持保护，而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族群的身份认同产生一定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就华人族群而言，或因前述二十世纪早期，受到中日战争刺激与中国民族主义输入，深远影响华人群体的族群意识与民族主义思潮，又或因当代马来西亚的马来族群优势造成不平衡，是族群关系紧张局面形成的又一原因。

六、结论

本文以“武汉合唱团”抗战音乐为研究对象，以跨文化传播角度，分析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抗战音乐与民族主义输入，及本土民族主义发展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日军侵华的历史背景成为该团建立与出访马来亚的关键外部因素，中国抗日战争与全民族抗日的民族主义促进，则为抗战音乐的兴起和发展提供土壤。总体而言，以“武汉合唱团”为代表的抗战音乐在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历史传播中的变迁，能够反映不同历史阶段的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的发展情状，与本土华人在民族主义、身份认同上的转变。

在民族主义生成与发展视域下，就“武汉合唱团”与中国而言，此类中国艺术团体的产生，与中日战争历史直接相关。而这一历史流变催化该团民族主义意识与民族共同体身份的固化，并且影响到“武汉合唱团”的历史与其抗战音乐本身。由于平、津、沪、宁等地的相继沦陷，武汉成为中国的抗战中心。在内部的日军侵略加剧与外部的世界局势不利共同作用下，这一时期的中国充斥着民族主义色彩，国共在思想上从相互间的“阶级敌人”转变为一致抗日的“兄弟部队”，“国家存亡”凌驾于党际斗争之上。以政治部第三厅为代表的武汉文艺宣传工作组织机构，即为国共密切合作之体现。这一时期武汉救亡歌咏运动蓬勃发展，民族主义的影响不仅作用于该团历史本身与团员言行之上，亦于其在马来亚公演的抗日歌曲中体现，通过建构性、互文性的文本强化共情，深描历史事件与社会情状，基于情感认同的历史记忆、家国叙事与全民化倾向成为其抗战音乐的主要特征。而在武汉失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日救亡运动受到波及，“武汉合唱团”则成为在马来亚承载中国集体记忆与民族主义情感的“歌声证言”。该团由原“武汉合唱团”滞留武汉团员自组成立，其身份倾向性较弱，分三批出发，前往马来亚进行宣传筹赈活动。出访过程中团体成员有小幅变动，中国籍团员共计二十八人。

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合唱团”作为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的跨境传播的输入一方，本土华人作为回应的一方，其主要形式以抗战音乐为主，

亦有部分话剧作品。该团音乐作品类型分为全民抗日、军民救国、日军劣行、抗日捐输、华人爱国与中华文明五类，主要选取的是具有影响力的与具备华人指向的作品。该团受到国共两党的共同支持，亦为国民政府、中共的发展提供机遇。在传播过程中，其与本土华人并非绝对意义上施动与受动关系，而是具有互融性，华人唱歌、学歌，共同传播，而因华人群体的特殊性，该团亦对于演出内容进行与华人生活情境相结合的改编，在华人领袖的参与之外，该团主要获得“草根”支持。在访问期间，合计参与人数约210余万，筹叻币230万元。但是同时，该团亦面临团体内部矛盾、政见分歧与本土华人身份认同差别等因素的作用。

事实上，马来亚华人的民族主义生成和发展，是历经历史进程的“历史化”。在中日战争期间，本土华人受到中国南来艺术团体感召，国家概念与集体意识逐渐形成。在日军南侵与马来亚日占期间，华人民族主义式微，本土民族主义固化过程中，本土华人从早前的“虚拟认同”，逐渐过渡至以马来亚作为认同对象的“想象的共同体”。基于此，在历史因素与社会环境的演进中，马来亚华人发生身份认同转变，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等抗敌组织动员下，本土华人为抗日战争所做的种种努力，影响到马来西亚历史发展。新生本土华人歌曲，在主要内容、艺术特征和语言风格上，多带有马来亚风土文化与在地情怀，能够反映其身份认同的转向，亦有早期“武汉合唱团”民族主义跨境传播的延续。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战败，英国政府重新获得原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马来属邦的管理权，新加坡自海峡殖民地脱离，马来联邦由英国管理。五十年代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多为多元认同状态，属地认同与血缘认同交织。英国政府为调解族群关系，塑造国民身份进行了努力，然而一直沿用的族群分治与不平等的族群政策，使族群对立成为马来西亚独立后需要面对的议题。作为诞生于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之中的多元族裔、宗教、文化的新兴国家，前期，马来亚仿效西方民族国家概念，即以单一的主要民族作为国家主权象征的形式，以追求文化同质性与主体族群优势地位的方式，使少数族群被动同化。相关政策招致以本土华人为代表的非马来族群的反对，由此，当局提出建构多元并存的“马来西亚民族”，

满足所有国民期待的国家构想。基于此，马来西亚华人的民族主义认同转向在地化的高潮在于五十年代中期与九十年代，本土化的华人音乐亦因此应运而生。在当代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以“武汉合唱团”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南来民族主义的影响，以及华人民族主义声音虽未完全消弭，却也远离了马来亚华人历史舞台的中心。

注释

- 1 本文的研究时段虽横跨马来西亚的成立，然而因民族主义高涨时期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且因本文主要讨论的“武汉合唱团”访问期间民族主义的跨境传播处于马来西亚独立前，故此使用“马来亚”作为标题，未使用“马来西亚”。（此处包括新加坡）
- 2 该书为“武汉合唱团”相关史料整理合集，根据出版说明，该书由叶奇思走访南洋各地收集各类报刊、资料、书籍辑选而得，以时间为主线，原始出处无考。由此，本文引证时辅以史料题名，以便读者辩证。
- 3 相关资料可参考：田稼〈试述演剧队的发展经过及其特点〉（《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辑委员会1958：221-244），颜一烟〈在救亡演剧二队的日子里日记摘录1937年9月-1938年6月在郑州和武汉〉（《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辑委员会1963：176-192），洪深〈我们是这样战斗过来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辑委员会1959：105-109），〈上海救亡演剧队组织沿革及抗敌剧团第二期工作意见书〉（1938年-193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8：90-94）。
- 4 “长江局局成立后，迅速恢复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大量发展党员，积极领导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91：481）
- 5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资料，对于“武汉合唱团”来访吉隆坡，李孝式有支持呼吁与实质捐助。例如，李孝式致辞，“盖贵合唱团所附使命，系抱定爱护祖国热肠，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出力，用激昂慷慨之歌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贵合唱团本此宗旨，对一般侨胞宣传，加以崇论宏议，确以提高民族意识，增强爱国信念。”（〈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吉隆坡十余万侨胞欢迎合唱团盛况，主席李孝式致辞，推崇该团在星柔甲森成绩，该团今晚起在中华大会堂演唱〉，叶奇思2006：469）

参考文献

- 陈白尘、董健2008。《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899-1949》。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 陈诚1938。《政治部成立之意义及工作人员应守之信条》。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档号：008-010301-00047-002。
- 崔贵强1990。《新马华人国家认同转向1945-1959》。新加坡：南洋学会。
- 崔婕2020。〈夏之秋与武汉合唱团〉。《海外纵横》6。
- 陈嘉庚著、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编1989。《南侨回忆录》。上海：上海书店。
- 杜青主编2009。《胶林，我们的母亲——一个音乐家艰难的学习路程》。八方文化创作室。
- 丰子恺1938。〈谈抗战歌曲〉。《战地》4：98。
- 郭鹤年口述、Andrew Tanzer编著2017。《郭鹤年自传》。香港：商务印书馆。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38。《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报告》（1938年4月1日-8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档案，七七二/775。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39。《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报告》（1938年11月至1939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档案，七七二/776。
- 广州新马侨友会1922。《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香港：见证出版公司。
- 槐华2005。〈听故乡的歌——悼黎华〉。载彭国强主编《激情岁月》。香港：香港见证出版社，234-243。
- 槐华2013。《歌典 南洋之歌1939-2011》。新加坡：朝晖艺术及文化公司。
- 见田宗介、栗原彬、田中义久1988。《社会学事典》。东京：宏文堂。
- 刘恒秀2018。《抗战时期的武汉合唱团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硕士论文。
- 廖建裕2020。〈新加坡国族打造和国民意识培育〉。《怡和世纪》44：70-75。
- 林开忠1999。《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刘楠楠2017。〈夏之秋与武汉合唱团〉。《中国档案》5：80-81。
- 罗武1982。《马来亚的反抗》。香港：海泉出版社。
- 李盈慧1997。《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12-1949）》。台北：国史馆。
- 李盈慧2003。《抗日与附日：华侨、国民政府、汪政权》。台北：水牛。
- 李业霖1996。《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吉隆坡：华资企业有限公司。
- 毛磊1985。《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 麦留芳2012。《虚拟认同：早期马来亚华人的爱国歌曲》。新加坡：新加坡华裔馆。
- 《马来亚华侨抗敌军上国防部呈》（1946年2月21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

- 党史馆藏, 特种档案, 档号: 5/10。
- 《马来亚联邦》。国史馆藏, 外交部档案, 档号: 172-1/0363。
- 《马来亚联邦新宪制》。国史馆藏, 外交部档案, 档号: 172-1/0364。
- 宁静1992。〈夏之秋与武汉合唱团〉。《中央音乐学院学报》3: 63-65。
-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1947。《大战与南侨》。新加坡: 新南洋出版社。
- 钱杉杉、何启才2022。〈“新中国剧团”在马来亚的民间外交活动与宣传研究〉。《台湾东南亚学刊》2: 93-134。
- 钱杉杉、何启才2022。〈越界与统合: 冷战期间银星艺术团在马来西亚的文化外交〉。载华社研究中心、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联合出版《蜕变中的马来西亚与东南亚华人社会: 2021年第五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论文集》。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 289-334。
- 秦孝仪1978。《总统蒋公大事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卷)上》。台北: 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
- 秦孝仪1984。《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1963。《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4卷)日中戦争(下)》。东京: 朝日新闻社。
- 苏颖欣2019。〈马华文化主体性的焦虑: 中国性、主体性与第三世界〉。《人间思想》10: 148-171。
- 武汉合唱团1940。《武汉合唱团海外工作纪念册》。新加坡国立图书馆藏, 微缩文献档号: NL1834。
- 吴继岳1986。〈艺海钩沉忆“中艺”〉。载中国歌舞剧艺社编《南洋恋——中国歌舞剧艺社南洋演出40周年纪念》特刊。中国歌舞剧艺社编印, 9-12。
- 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1978。《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安: 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
- 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1993。《日治时期的新加坡口述历史访谈》。受访人: 陈蔚, 访谈日期: 1992年, 访谈地点: 受访者住家, 访问编号: 001351/11。新加坡: 口述历史中心。
- 谢侃侃2019。〈战前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国性”与“华人性”问题——以印马越泰为例〉。《东南亚研究》6: 130-151、158。
- 许云樵1984。《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 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
- 阳翰笙1986。《风雨五十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杨建成1982。《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5)》。台北: 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
- 杨凯淇2014。《鼓舞华侨支援抗战的“音乐力量”》。通讯。北京: 中新社, 9月4日。
- 叶奇思2006。《赤子丹心——武汉合唱团南洋筹赈巡回演出纪实》。北京: 中国华侨

- 出版社。
- 郑达1986。〈一次艰苦的转变〉。载中国歌舞剧艺社编《南洋恋——中国歌舞剧艺社南洋演出40周年纪念》特刊。中国歌舞剧艺社编印，41-44。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8。《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8。《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辑委员会1958。《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 《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辑委员会1959。《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二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 《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辑委员会1963。《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三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文化交流部2006。《华侨与抗日战争》。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 庄国土2001。《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91。《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0。《周恩来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9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祝家华1994。《解构政治神话——大马两线政治的评析（1985-1992）》。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 张茅2020。〈女报人李杰〉。《大公报》10月13日。
- 郑诗亮、孟繁之2014。〈周锡瑞谈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295。
- 曾瑞炎1988。《华侨与抗日战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曾昭正遗作，曾宪德整理2015。〈1938年武汉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大事回顾〉。载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春秋：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特刊》。湖北省内部资料，38-43。
- 《中央党部海外工作人员名册》（1943年9月18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档号：12/5.2。
- Abdul Ghapa Harun 1995. *Kebudayaan Kebangsaan dan Politik Pembinaan Negara Negara*. Kertas Kerja: Seminar Serantau Kebudayaan KeBangsaan, Kuala Lumpur, 12-13, December 1995.
- AKASHI, Yoji 1970.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Lawrence: Centre for East As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Kansas.
- ANDERSON, Benedict 201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ustralian Army Research Centre 2018. *Malaya: Lines of Japanese Advance (1941.12–1942.1)*. Canberra: Australian Army Research Centre.
- CASE, William 1993. Semi-Democracy in Malaysia: Withstanding the Pressures of Regime Change. *Pacific Affairs*, 66(2): 183-205.
- CASE, William 2004. Testing Malaysia's Pseudo-Democracy. In *the State of Malaysia*, edited by Gomez, E. London: Routledge.
- CHEAH, Boon Kheng 2012.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1-1946*. Singapore: NUS Press.
- CHURCHILL, Winston 2002. *The Second World War Abridged*. London: Pimlico.
- CLIFFORD, James 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RA, Fujio 2003. *Malayan Chinese and China: Conversion in Identity Consciousness, 1945-1957*. Singapore: NUS Press.
- Harper, T. 2009.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Mala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menterian Dalam Negeri 1988. Kearah memelihara keselamatan Negara (Kertas Perintah 14 Tahun 1988). In *ISA dan Keselamatan Negara*, edited by Aliran. Pulau Pinang: Aliran Kesedaran Negara.
- Mandatory Community Meeting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1942. *Map of the Assembled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for Meeting Use*. Maui: Story of Hawaii Museum.
- Ministry of the Japanese Navy 1938. *Japanese Navy Map*. Maui: Story of Hawaii Museum.
- ONG, Aihw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ONGKILI, James P. 1985. *Nation-Building in Malaysia: 1946-1974*.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ONG, Hak Ching 2000.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1942-55: The Dynamics of British Policy*. Bangi: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 Smith, Anthony D. 2009. *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 A Cultural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 Smith, Anthony D. 2010.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